

集體記憶與俠義概念：

清末民初野史中雍正形象之正統與裂變

黃 璿 璋*

摘 要

綜觀雍正相關野史發展，最早出現在文字獄鬆動的晚清；此時雍正多以劍俠的形象面世，相關野史如血滴子、呂四娘、不得善終等敘事也因應叢生，為形塑雍正集體記憶最初、也最重要的時期。晚清對於雍正皇帝的想像大多相悖於《大義覺迷錄》所宣稱的「正統性」，反以俠義小說的模式暗諷雍正得位之不正。本文試圖跳脫歷史學的考證框架，以集體記憶與文學生產的角度重新詮釋、定位歷史疑案——「雍正奪嫡」，觀察該事件於清末民初的通俗文學場域之中，如何駁反《大義覺迷錄》中宣揚的帝王正統形象，並以身體符號體現滿漢衝突與華夷之辨。

本文首先觀察晚清野史如何繼承、改造、顛覆《大義覺迷錄》以來所建構的王位正統與史書正統，並寄寓華夷之辨的教化性。其次，從民國時期日益蓬勃的武俠小說場域中，也試圖從其中觀察雍正敘事從「大義」到「俠義」的線索，討論文書史料上的「大義」之爭，如何被轉化為俠與俠間的爭鬥，而呂四娘的出現，更以「四娘」殺「四

* 作者現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子」的隱喻來尋求文化種族的正義。第三，以雍正遭到砍頭的敘事為主，分析作為清代國體象徵的頭顱如何在民國文人的想像中，以象徵明朝的軀體——呂四娘對清朝進行閹割，構成了小說當中的身體政治學。最後，薙髮、雍正、曾靜案等作為歷史事實，在清末民初的語境裡，為各階層知識分子共享的歷史資源；本文亦試圖指出通俗歷史小說與大眾記憶如何挪用歷史資源，並形成遊戲性與嚴肅性兼具的另一種國故論述。

關鍵詞：正統、雍正、俠義、野史、歷史小說、呂四娘、集體記憶

Distorted Image:

Transforming the Yung-cheng Emperor in Chivalric Fic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Huang Hsuan-chang

Abstract

For historians, the Yung-cheng Emperor was a great monarch of Qing dynasty. But he was transformed into a despot and peculiarly into a knight-errant in popular novels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hich was massively produced in order to invoke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barbarian. This article uses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llective of memory and narrative production to examine how the knight-errant Yung-cheng and his violent death, in which he was decapitated by the female knight-errant Lü Siniang (Lü's fourth daughter), were characterized, and how the Han's traumatic memory of Yung-cheng's totalitarianism and the ideals of anti-Manchuism were represented in the series of chivalric fiction.

This article begins with a reevaluation of the unofficial histories about Yung-cheng, which were recorded in *Dayi juemi lu* (Record of Awakening) and its numerous sequels in Late Qing. Next, it analyzes the

process in which Yung-cheng was shaped into a cruel knight in popular fiction through *Dayi juemi lu*, especially in chivalric fiction. In the fictional narrative, the assassination of Yung-cheng (the fourth son of the Qing royal family) by Lü's fourth daughter leads the readers to contemplate the Qing's legitimacy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Han Chinese against the Manchus. Finally,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decapitation of Yung-cheng compensates the public for their traumatic experiences under the Queue Order, the literary inquisition, and the memory of hsüeh ti-tzu (flying-guillotine gang) of Qing dynasty.

Keywords: Yung-cheng, Chivalric Fiction, Historical Fiction, Lü Siniang, Collective of Memory

集體記憶與俠義概念：

清末民初野史中雍正形象之正統與裂變^{*}

黃 璿 璋

一、前言

愛新覺羅·胤禛生於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三十日，逝於雍正十三年（1735），享年五十八歲；其在位短短十三年間，上承康熙（1662-1722）、下啟乾隆（1711-1799），具有非凡的歷史地位。其治世雖短，民間卻也流傳著許多傳言，最為歷史學界廣泛討論者，即屬「改詔奪嫡」之說。雍正繼位一案為學界熱門議題，大多在「篡位」與「合法」之間考辯。早期有孟森（1868-1938）、王鍾翰¹（1913-2007）等學者較支持「雍正篡位」說，七〇年代後則以金承藝²

^{*} 本文初稿曾以“Distorted Image: Transforming the Yung-cheng Emperor in Chivalric Fiction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為題，發表於2014年「歐洲漢學會議」（2014 EACS）。本文撰寫過程蒙高桂惠、鄭文惠、梅家玲諸位師長悉心指點，獲益良多；《東亞觀念史集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不吝賜正，謹致謝忱。

¹ 王鍾翰：〈清世宗奪嫡考實〉，《燕京學報》1949年第36期（1949年6月），頁205-262。

² 金承藝主要於孟森與王鍾翰說法未及之處加強考證，於七〇年代陸續發表三篇文章，為雍正篡位說之重要代表。參見金承藝：〈從「胤禛」問題看清世宗奪位〉，《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頁189-222、〈胤禛：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6

(1926-1996)、金恒源³等繼續強化；而主張「合法繼位」者在晚近則以吳秀良、⁴楊啟樵、⁵馮爾康⁶等為代表，認為雍正正是康熙的合法繼承人。直至目前，兩方說法亦無定論，正如陳熙遠所言：「歸根結柢，現存所有康熙遺詔的原件永遠都無法解答雍正究竟是『奉天』還是『承運』。」⁷

上述雖將雍正放置歷史學的視野下研究，但學界對正野諸史的考察大多已然觸及大眾文化對歷史公案的挪用與想像，⁸這也說明了無論雍正是否克承大統的「奉天」抑或改詔奪位的「承運」，其疑案本身早已溢出學術的高閣，流行並深化在民間的想像之中。除改詔一事，此傳言更與殘害骨肉、忠臣等事蹟共振，世人「因將世宗之嗣位，與雍正間之戮諸弟，張皇年羹堯（1679-1726）及隆科多（？-1728）罪案，皆意其並為一事，遂墮入五里霧中，莫能瞭其實狀」。⁹考察雍正奪位、殘害兄弟的民間野史，自雍正當朝即已流行，卻因當時嚴峻的文字獄看似銷聲匿跡。但清人有關本朝歷史筆記，在嘉慶朝被迫鬆動言論控制以後漸出漸多，或填補清朝開國史之空白，或重述已逝列帝之遺憾；在晚清之際，更出現大量野史筆記的刊刻，內容處處體現了滿

期（1977年6月），頁95-122、〈胤禛、非清世宗本來名諱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頁131-158。

³ 參見金恒源：《正本清源說雍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⁴ 參見 Silas H. L. Wu,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⁵ 參見楊啟樵：《雍正篡位說駁難》（上海：上海書店，2012年）。

⁶ 參見馮爾康：《雍正繼位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⁷ 陳熙遠：〈皇帝的最後一道命令——清代遺詔製作、皇權繼承與歷史書寫〉，《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4年6月），頁209。

⁸ 如馮爾康曾以歷史真偽角度對《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清史演義》、《梵天廬叢錄》、《呂四娘演義》、《血滴子》等書置辯，考察野史中述及人物、事件。以奪嫡事件為例，馮氏認為：「把這歷久相沿的傳說及由此而衍化的其他改詔說，一股腦兒取來，這是用傳聞異說以媚讀者，並非抱著傳流信史的態度澄清雍正繼位疑案。」參見氏著：《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635-638。

⁹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統考實〉，《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519。

漢矛盾與衝突。¹⁰ 正因晚清時期，雍正的野史敘事大量復出，並在民國時期漫衍開來，雖學者們認為野史傳聞多與史實相違，均非實錄，但野史傳聞卻孕育、催化了民間對於雍正的歷史記憶與想像，扮演著重要的媒介角色。雍正野史在帝國餘暉時期持續地發酵、衍異，從一樁歷史公案發展到筆記軼聞的想像，民國時期更變形為舊派武俠小說的形式流傳，將雍正描述為一武俠形象；在層層的重編、改寫等遞進過程下，亦積累出現代如二月河等小說家的詮釋，甚至擴及端木蕻良（1912-1996）《曹雪芹》等《紅樓夢》索隱派的閱讀與創作，皆是雍正奪嫡事件所產生的漣漪效應。正因為從晚清到現當代，雍正野史經過文人筆墨的迴環複沓，才共構成民間熟悉的「雍正王朝」的神話。

雍正的相關故事內燦於當代華人的記憶之中，在歷史長河的全類藝術形式中不斷被複述與改寫，並被「神話化」為新的歷史傳說。此種「神話化」如柯文（Paul A. Cohen，1934-）所指出，是通過對於歷史資料的歪曲、簡化與省略來完成，大眾「也許真的相信他的觀點是『正確的』，然而，他們的目的不再於擴大或加深這種理解，而是要使之為政治、意識形態、自我修飾和情感等方面的現實需要服務」。¹¹ 意即，在言說雍正野史的背後，更涉及民族國家對於自身歷史的理解與認同；如將這些文本施以症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應能尋繹出民間集體的意識形態與歷史記憶的相互作用。儘管此類文本多為少數文人所創，但其衍異的創作背後，實牽涉群眾的社會、文化等心理脈動；正如哈布瓦奇（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所言，通常被認為是個人式的記憶實際上可連結到

¹⁰ 參見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頁90-94。

¹¹ 柯文在考察義和團文本時，認為歷史學家重塑歷史的工作與另外兩條「認知」歷史的路徑——經歷與神話是格格不入的。作為神話的歷史雖與「歷史真相」相悖，但更普遍於社會各階層所認真的歷史形象所接受。關於歷史事件的神話化，可參見〔美〕柯文（Paul A. Cohen，1934-）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頁211-217。

群體的、社會的集體記憶 (collective memory)，經由不斷地追憶 (recollect)，觀念、事件被置入於意義的框架之中，並標幟著部分群體的記憶整合與社會、歷史認同。¹² 自 1980 年代以來，集體記憶／失憶與群體認同在歷史學與人類學的發展，常被用於分析近代國族主義下的歷史建構過程，以及相關民族英雄、人物與其事跡如何被想像與建構。¹³ 回溯雍正嗣位等流言，在雍正朝《大義覺迷錄》中早有記載，且又與曾靜 (1679-1735) 與呂留良 (1629-1683) 文字獄案、華夷之辨等事件叢生。在歷經禁書、文字獄政策等後，流言與記憶似乎漸被遺忘，但在晚清時期重新又被召喚。除了喚回對於事件 (如奪嫡改詔等) 的記憶外，雍正的形象也開始躍出於歷史文本，以「好殺」、「劍俠」等形象活化，從集體記憶的角度來看，雍正野史的敘事除了建構出不同於國家機器掌控下的文字歷史外，更隱含著對國家統治者合法性的強烈去除、抵抗與挑戰。¹⁴

綜觀雍正野史敘事在晚清時期大量出現，除將雍正的故事從單一情節開始發展向長篇故事外，並以武俠小說的形式來包裝。因而，本文擬就此一世變時期作為考察時段，藉由集體記憶的角度，觀察雍正皇帝的形象在傳衍過程中，民間如何建構、想像，甚至如何以武俠小說貫穿「九王奪嫡」、「改詔篡位」與帝王駕崩等事件。¹⁵ 歷來如王汎

¹² 參見 Maurice Halbwach, Lewis Coser 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¹³ 王明珂指出，二十世紀末期在「後現代主義」的學術醒覺中，學者們開始注意多元的、邊緣的、異常的現象，並從中分析意義「解構」歷史與國族建構。參見氏著：〈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頁 3。

¹⁴ 如同黃應貴指出，民族社會在其歷史建構之中，集體記憶藉由不同記憶載體的選擇有架構地記憶、遺忘與形塑認同，並涉及到該民族的文化特性。參見黃應貴：〈記憶、認同與文化〉，《人類學的視野》(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72-98。

¹⁵ 歷來學界亦不乏以集體記憶的角度，作為帝王敘事的研究進路者，參見汪榮祖：〈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4 期 (2009 年 6 月)，頁 1-39；劉瓊云：〈帝王還魂——明代建文帝流亡敘事的衍異〉，《新史學》第 23 卷第 4 期 (2012 年 12 月)，頁

森、吳秀良、馮爾康等歷史研究者在研究雍正與相關文字獄案時，皆已指出該事件在晚清於文學創作中的復蘇，甚至成爲反清倒滿與形塑國族的一個助力；¹⁶ 但因較偏重史學考證，往往忽略文學創作中的反應。儘管吳秀良曾以雍正劍俠系列的小說討論，觀察歷史事件如何成爲種子事件（seed facts），從而掌握小說中的歷史性，但其研究主要聚焦於歷史事件如何重組，並非深入文學續衍的脈絡中探討。¹⁷ 清末民初時期，吳氏所稱的「種子」事件實際在民間的記憶與想像澆灌下發芽茁壯，也涉及一連串符號與意義上的重新編碼；本文即試圖將雍正野史的研究從歷史學的檔案延展到文學場域，聚焦於清末民初雍正的野史敘事，從文學的「想像」中探究敘事背後的社會集體與個人的情境（context），重新觀察、定位雍正故事背後的深層內涵與意義。

二、王朝的記憶與重寫 ——從《大義覺迷錄》可見的流言談起

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清聖祖康熙傳位詔書》¹⁸

雍正六年（1728），湖南百姓曾靜受到呂留良反清論著的啟迪及當時流傳種種對雍正的失德傳言，派遣門生張熙（生卒年不詳）至成都投遞〈生員應詔書〉給陝西總督岳鍾琪（1686-1754）。文中歷數雍

61-117。

¹⁶ 參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頁392。

¹⁷ 參見 Silas H. L. Wu,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In *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 (Volume II)*, ed. by Yen-p'ing Hao and Hsiu-mei Wei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8), 1217-1259.

¹⁸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藏：《明清檔案》登錄號037033。

正「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耽酒、淫色、誅忠、好諛任佞」十大罪狀，希望「宋武穆王岳飛後裔」岳鍾琪能「乘時反叛，為宋明復讎」，但後來曾氏被岳鍾琪出賣，在雍正下令下，形成全國性搜查、逮捕的大規模文字獄案。¹⁹ 後雍正有感於「匪類之造做妖言，暗中煽動者，又不知幾希矣」，因而編寫、廣布《大義覺迷錄》，期能「開導訓諭，覺悟愚蒙」，²⁰ 消除曾靜與天下讀書人對於雍正的流言與負面想像。

《大義覺迷錄》（下文或簡稱《覺迷錄》）一書，收錄曾靜所撰的逆書邪說及雍正反駁的論旨，由雍正親自選輯而成，共分為4卷，509頁。其中涉及一連串對於滿州政權的「得統之正」、「君臣之義」、「華夷之辨」等議題，²¹ 具有政治與文化的辯證意義。²² 雖對於雍正的不利傳言在當時嚴厲的文字獄查禁中銷聲匿跡，但《覺迷錄》所載的內容卻也意外地成爲了解當時種種傳言的最佳途徑。在流言之中，雍正最爲在意即屬有關即位過程的傳言，在雍正對曾靜的辯駁中，可以看見雍正對破除此傳言的積極性。目前可見最早對雍正繼位

¹⁹ 相關背景參見：〔美〕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Treason by the Book*）（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²⁰ 雍正曾感於「近來風聞陝西之民竟有怨朕而私相謗議者，總因十數年來，陝西居住之允漣、塞思黑、年羹堯、延信等，皆懷挾異志、包藏禍心。其脅從之黨，實繁有徒。如塞思黑之令狐士儀、年羹堯之鄒魯、淨一道人、延信之道姑王氏等，皆公然以反叛爲眾人之倡，則其他匪類之造作妖言，暗中煽動者，又不知其幾希矣。」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卷105，頁1580。

²¹ 王汎森曾整理《大義覺迷錄》所載雍正詢問曾靜三十七道問題，並粗加歸類爲七種：「第一、關於滿州政權的合法性。第二、華夷之辨。第三、關於君臣之關係。第四、關於天災人禍以及清之失政。第五、關於貧富不均與科舉之弊。第六、呂留良思想的影響。第七、也是最重要的，關於曾靜對雍正的控訴以及繼位之謠言。」參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350。

²² 對於《大義覺迷錄》如何將「君臣之義」放置在「華夷之辨」的觀念之上，可參見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61-87。

之流言，即載錄其中：

先帝欲將大統傳與允禩。聖躬不豫，時降旨召允禩來京，其旨為隆科多所隱。先帝賓天之日，允禩不到，隆科多傳旨，遂立當今。

聖祖原傳十四阿哥允禩天下，皇上將十字改爲于字。

聖祖皇帝在暢春園病重，皇上就進一碗人參湯。不知何如，聖祖皇帝就崩了駕，皇上就登了位，隨將允禩調回囚禁。太后要見允禩，皇上大怒，太后於鐵柱上撞死。²³

在是書裡，雍正對傳言分別答辯，強調「傳位於朕之遺詔，乃諸兄弟面承於御榻之前者，是以諸兄弟皆俯首臣伏於朕前而不敢有異議」、²⁴「太后諭云：我只知皇帝是我親子，允禩不過與眾阿哥一般耳，未有與我分外更親處」²⁵等說法。以全書來看，雍正一一破除了不實謠言，並時時宣揚其繼位之「正統」；此處所言的正統已非單純只有雍正個人即位之正統性，亦為滿人定鼎中原的「正統」、消解「華夷之辨」的「君臣之義」之「正統」，甚至更承載著在史書創作上官方正統的多重性。

《覺迷錄》作為雍正皇帝匡正天下視聽之用，在「若有不知，必從重治罪」的「強迫閱讀」政策下迅速流傳開來，甚至可以在韓國與日本等國外資料中發現。內容雖載雍正對「謀父、逼母、弑兄、屠弟、貪財、好殺、耽酒、淫色、誅忠、好諛任佞」十項罪狀的澄清自辯，為滿人強化自我政權的認同與正統之重要標幟，但從現存野史來看，民間似乎對雍正的辯駁呈現失憶，反倒是「許多有關康熙傳皇子的醜聞也因雍正的上諭裡毫無顧忌的表露，而廣布於世」。²⁶ 職

²³ 以上分別見於《大義覺迷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據1730年版影印），頁350、352、353。

²⁴ 《大義覺迷錄》，頁358。

²⁵ 《大義覺迷錄》，頁361。

²⁶ 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365。

是之故，在雍正死後三月乾隆即下令全面禁繳該書，據《東華續錄》載，此事可能為《世宗實錄》的總裁徐本（？-1747）所建議。²⁷《覺迷錄》中載曾靜與雍正一來一往之間的答辯，可以看見民間記載的野史傳言，透過不同於官方的文化載體建構差異的歷史想像；是書從編寫、頒行到禁燬的過程當中，也開始形成競爭強烈的官史／野史之爭。官方一方面消除野史中的民間記憶，另一方面也不斷編織官史、官書，形塑其官方史觀，兩者即在生產歷史知識、歷史記憶的競爭中相互消長。²⁸對於雍正是否殘害其兄弟與繼位疑案，民間的記憶與想像也在動態的歷史詮釋過程中歧散。正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所言：

一個皇帝以為向天下人說明對他不利的傳言，便可讓流言不攻自破，因為眼睛雪亮的後代會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卻記得了謠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卻以為把書毀掉，便能告慰父皇在天之靈。而他的子民卻以為他之所以想毀掉此書，就是因為書中內容乃真有其事。²⁹

正是在此過程中，雍正早已被扭曲、產生畸變，甚至在小說與戲劇等大眾視野下被塑造成邪惡的帝王形象。即便該書在乾隆朝以後被禁燬，但民間史觀對於世宗的負面想像早已深植人心。

早在清初時期，朝廷面對民間傳言即以嚴格的文字獄加以查禁。

²⁷ 參見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朝（卷1）》（臺北：大通書局景印本，1968年），頁15。必須注意的是，關於徐本其人，王汎森曾考證《清史稿》、《清史列傳》、《國朝耆獻類徵》、《從政觀法錄》、《漢名臣傳》等書，皆未提及徐本與查禁《大義覺迷錄》之事。關於乾隆查禁《大義覺迷錄》之相關過程，可參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362-370。

²⁸ 關於清代文字獄案對清代文學的作者、讀者、書商等所造成的影響，參見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頁393-500。

²⁹ [美] 史景遷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頁252。

在歷雍正、乾隆朝以後，文人學士多囿於文字獄之禁，記載傳言稗乘的野史受到高壓箝制因此而衰微，對於世宗的不利傳言亦不例外。但「自從鴉片戰爭以後，爆發了太平天國的革命，有心人士大聲疾呼，於是記載實事的野史稗乘，如波濤怒起，春弦叢生；進百年來的外患頻仍，民生塗炭，有心人事觸景生情，記載實事的隨筆日記，種類尤繁，終於發生了辛亥舊民主主義革命。這可以說是由衰微而到極盛時期。」³⁰ 在晚清，「萬形而無形」的文字獄之「風」已開始止息，³¹ 並有大量清宮秘聞印行，雍正多謀、邪惡的形象又再度被召喚。

晚清因印刷事業的發達與西學視野下，小說地位予以提昇，並藉以抨擊時事等原因，締造了小說史上空前的繁榮；³² 許多非議皇帝、揭露宮廷鬥爭的筆記野史與歷史小說相繼出現，儘管雍正皇帝在歷史學評價中是奠定清朝盛世的明君，但《覺迷錄》對於雍正殘迫漢人、忠臣、兄弟等的暴君形象之記載已在民間記憶中播種，並茁壯於晚清筆記、章回歷史與舊派武俠小說等新舊文類裡。發行於1915年有「清一代野史的總匯」³³ 之稱的小橫香室主人（生卒年不詳）《清朝野史大觀》中，卷一《清宮遺聞》即載錄〈清世宗襲位之異聞〉、〈年羹堯擁立世宗功〉、〈世宗晏駕之異聞〉與〈雍正外傳〉；二〇年代前後陸續又有燕北老人（生卒年不詳）《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胡蘊玉（生卒年不詳）《滿清外史》和許指嚴（？-1923）《十葉野聞》等皆以筆記形式分別記載；而前行文本所述的單一事件又被組裝為關乎雍正一生的敘事，以歷史演義的方式書寫，涉及世宗事蹟者則以蔡東

³⁰ 謝國楨：〈明清野史筆記概述〉，《明末清初的學風》（臺北：仲信出版社，1985年），頁84。

³¹ 「萬形而無形」的「風」為龔自珍（1792-1841）語，王汎森曾用以指稱清初以來大小文字獄案在各階層所成的一種無所不在的心理壓力與滲透力。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文獻中「自我壓抑」的現象〉，頁394-395。

³² 參見阿英：《晚清小說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頁1。

³³ 夏祖恩：〈「清代野史」的史學地位初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101。

藩（1877-1945）《清史通俗演義》、許慕羲（生卒年不詳）《清宮歷史演義》、許嘯天（1886-1946）《清宮十三朝演義》為代表；以武俠小說形式創作的單行本則要到二〇年代後期才有孫劍秋（生卒年不詳）的《劍俠呂四娘演義：清朝第一女俠》、陳蓮痕（生卒年不詳）《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等著作。³⁴（參見附表）

整體而言，民國時期對雍正的筆記故事仍圍繞在「改詔奪位」、「骨肉相殘」、「不得善終」三大事件上，但雍正朝到至清末民初歷時已久，許多關於單一事件的想像在一系列的續書中開始產生裂變，並充斥著不穩定性與多樣性。在「改詔奪位」上，《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中的〈清世宗襲位之異聞〉即挪用了康熙「手書遺詔：朕十四皇子，及繼承大統。」的傳聞，但不同於《覺迷錄》「將十字改為于字」之說，替之以「私改十字為第字」。值得注意的是，該故事又說到「竊詔改篡之策，年羹堯實主持之。蓋世宗之母，先私於羹堯，入宮八月，而生世宗。至是，乃竊詔篡，令為天下主。故當雍正時代，羹堯權傾左右，而卒以醉誅。」³⁵此條目不僅解釋了年羹堯（1679-1726）在雍正朝的權重與驕橫，卻在晚年遭到雍正的九十二條大罪處死之事；³⁶更試圖將年氏「前蒙奇遇，後遭嚴譴」歸因於「擁立世宗功」和其母「私於羹堯」兩件事情上，除否定雍正正在繼承權上的王位正統性，更否定胤禛王室的血緣正統。「年羹堯擁立世宗」雖可復見於《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的〈竊改遺詔之真相〉³⁷與《滿清

³⁴ 本文選擇以清末民初野史中描繪清世宗從「奪位」到「不得善終」一生為主要的研究文本。晚清民國時期所流行的「八大劍俠」系列、《八大劍俠傳》、《雍正劍俠圖》到王度廬（1909-1977）的《雍正與年羹堯——新血滴子》，因內容多在描寫活動於清康熙至乾隆年間的俠客事蹟，非本研究聚焦之處。

³⁵ 小橫香室主人：〈清世宗襲位之異聞〉，《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頁19。

³⁶ 《清宮遺聞》亦有〈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年羹堯擁立世宗功〉兩條，記錄年羹堯於當朝之驕橫行爲。參見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頁22-24。

³⁷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

外史》的〈胤禛竊詔改竄〉，³⁸但其後的《清宮十三朝演義》、《清宮歷史演義》、《呂四娘演義》、《雍正奪嫡》卻皆以「隆科多改詔」為主要情節，³⁹考察原因當其為胤禛母兄，以國舅身分較易接近聖祖康熙，也可能此版本亦較接近《覺迷錄》所載，就結果而言，也淡化了雍正為年羹堯之子血緣不正的記憶。而對於改詔一事，相關續書較為不同的是，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僅將嗣位前的胤禛描繪成鬼祟情狀，並不直接挪用竄改「十」字為「于」字，說道聖祖「只是舌頭蹇澀，說到十字停住一回，方說出四子二字。」並說「清聖祖晏駕事後，後人互相推測，議論甚多。或且目世宗為楊廣，年羹堯、隆科多為楊素、張衡，事鮮左正，語不忍聞，做書人所以不敢附和也。惟聖祖欲立皇十四子允禔，皇四子竄改御書，將十字改為于字，此則故父老皆能言之，似不為無因。但證諸史錄，亦不盡相符。作者折衷文獻，語有分寸。」⁴⁰表面上雖不隨便沿用故老傳言，但在「語有分寸」之際也暗示了皇位欲傳位給十四子，而雍正得位不正之事。

除了繼續就涉及「謀父」的改詔奪位故事加以擴寫外，對於《覺迷錄》所述「弑兄」、「屠弟」、「誅忠」等，在《清宮遺聞》中的〈清代骨肉之慘禍〉、〈兄弟鬩牆〉、〈胤禔慘死〉、〈清世宗殺隆科多之詔〉、〈隆科多之獲罪〉、〈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以及後來講述的諸白話小說中皆被提及，但大多皆不出《覺迷錄》所載，直接挪用、整合了「前行史料」加以組構，描述其懲治、囚禁、毒害允禔（1672-1735）、允禩（1681-1726）、允禔（1683-1726）、允禩（1683-1741）、允禩等兄弟的過

頁 42。

³⁸ 胡蘊玉：《滿清外史》，《滿清野史·正編二十種》（成都：昌福公司，1920年；臺北：新興書局，1983年），頁 585。

³⁹ 參見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上海：國民圖書公司，1925年；上海：新華書店，1948年），第 32 回「改遺詔雍正登位 好美色胤禔喪命」，頁 138-141；許慕義：《清宮歷史演義》（武漢：武漢古籍書店，1985年），第 56 回「施法術太子發狂 改遺詔世宗即位」，卷 8，頁 4-8。

⁴⁰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1916年；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第 30 回「暢春園聖祖賓天 乾清宮世宗立嗣」，頁 192。

程；在官方與民間對於歷史的詮釋之爭中，集體記憶終究斜傾向民間，在不斷地嵌入與複述之中，背離了雍正再三申明的「大義」。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在史料上繼續發揮外，民間甚至將雍正皇帝集權與高壓的政策想像加以情節化與形象化，出現了許多傳言外的副文本。如傳言中雍正吸納一群訓練有素的偵查特務，替他監視臣民，《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即載時人王雲錦（1657-1727）於元旦早朝後，與朋友作葉子戲（鬥紙牌），但因忽失一葉而作罷；「一日早朝，世宗問元旦作何消遣。雲錦具以實對。世宗喜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⁴¹ 故事或云「伺察之嚴密」，或云「專制到如此地步，可稱極點」，⁴² 皆可反映雍正的專制與集權政策。而在雍正特務部隊中，最為人樂道者，當屬用以剷除異己的兵器血滴子的傳聞。血滴子始終未見於官方史料，但其形象反覆出現在雍正相關的野史中，據聞其形渾圓似球，中藏快刀；專以罩人首級，其用法迅速敏捷，雖大庭廣眾之間殺人，亦倉促來不及發現。⁴³

最後則是關於雍正遭刺，「不得善終」的傳聞。據《清實錄》載，雍正病逝於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但其在兩日皆於圓明園與大臣議事，並未見其生病前兆。⁴⁴ 雍正逝世之突然，也引起了民間對其死因的一連串想像與傳言，在晚清的野史中，流傳最廣者即是遭到呂留良孫女的殺害。雍正在曾靜、呂留良文字案的處理裡，雍正不曾殺害直接涉案的曾靜與張熙，卻殺害了浙江呂留良一門，⁴⁵ 即便呂留

⁴¹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頁43。

⁴² 孫劍秋：《劍俠呂四娘演義：清朝第一女俠》（上海：益新書社，1925年），第4回「除九族暴君施辣手 病逆旅老僕咽酸心」，頁30。

⁴³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頁43。

⁴⁴ 參見《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卷159，十三年八月甲申、丙戌條。

⁴⁵ 王汎森曾推論，如果世宗殺害曾靜，臣民必猜想皇帝是爲了毀滅自己一手導演整個過程的證據，所以不但不殺害曾靜，更要其去浙江、蘇州、江寧等地宣講《大義覺迷錄》；「呂留良的種族思想不僅冒犯了雍正一人，而是冒犯了整個滿族，所以被告者不是雍正，而是整個滿族，因此再嚴厲的懲罰都無法牽扯上個人惱羞成怒、消滅證據的問題。雍正公開的說詞是：呂留良侮辱的是其父親，他不能代父原諒呂留良；而曾靜侮辱的是其個人，

良、呂葆中（？-1707）已死，亦要開棺戮屍，並將其孫輩流放寧古塔為奴。⁴⁶ 面對雍正不公平對待呂氏的「奇料理」，⁴⁷ 晚清小說家對呂氏一族加以招魂。如《清宮遺聞》載「漢人之義憤大起」，「當時留良孫女某，劍術之精，尤冠儕輩，為祖父報仇，入宮行刺，故世宗實未得令終」。⁴⁸ 呂氏一族在文學想像中被申以正義，「留良孫女某」除了為家族報仇，更是大舉「漢人之義」，為被消滅的明國報仇。

上述分別以「改詔奪位」、「殘害骨肉」、「不得善終」等事件勾勒出清末民初時期的續衍過程，而這些單一事件後續皆被重組為民間對於雍正一生的整體想像（詳見後文）。晚清以回首的姿態描述雍正的一生，在遙望與記憶的過程中，許多歷史事件皆產生了變化，甚至更增添了許多史書未見的想像成份，並在民間廣泛流傳，使人信以為真。對歷史考據而言，這或許是民間想像所產生的謬誤，但對於該歷史如何記憶、書寫，實際上更涉及一連串的价值認同與意識形態的操演。以《清史稿》為例，雍正在清遺民的筆下是「生有異徵，天表魁偉，舉止端凝」，並被比之於「漢之文、景」，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重要性。但如林志宏指出，《清史稿》的撰寫正處於後帝制（post-imperial）各項政治角力與衝突之時，是一顆歷史記憶選擇和角逐爭戰下的棋子。⁴⁹ 這場關乎歷史與集體記憶的「對弈」者究竟還有

他可以原諒之。」參見王汎森：〈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361。

⁴⁶ 參見陳垣：〈記呂晚村子孫〉，收於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特刊》（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景印本，1967年），頁1-4。

⁴⁷ 「奇料理」一詞出於雍正給鄂爾泰（1680-1745）的硃批諭旨中，說道：「遇此怪物，自有一番奇料理，卿可聽之」，見《雍正硃批諭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第5冊，頁2845。王汎森也總結歷來的檔案，認為此「奇料理」除了包括皇帝史無前例地與一位「彌天重犯」以筆訊方式作37次訊問外，更包括令當時人與現代史學工作者困惑的量刑方式，見氏著：〈從曾靜案看十八世紀前期的社會心態〉，頁360-361。

⁴⁸ 小橫香室主人：〈清世宗晏駕之異聞〉，《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頁27。

⁴⁹ 林志宏：〈文化政治：書寫中的自我認同〉，《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頁134-135。

誰？在晚清眾聲喧嘩的語境中，更多不同於《清史稿》忠貞前朝、各自隱晦、蔑棄的立場，如《清史要略》、⁵⁰《清史纂要》⁵¹等在撰寫時雍正史事時，皆選擇直接挪用對雍正不利的傳言，描寫其性「猜刻」、「寡恩」；在《清史稿》遺民記憶的另一面即對立著野史的民間記憶，其各自以舊臣民／新國民的姿態編織史書，書寫各自對王朝的最後記憶。甚至我們可以從後來的《清宮十三朝演義》中，雍正「腮骨外露，必是忘恩負義之徒」、「與越王勾踐之長頸鳥啄，同一考語」⁵²等形象來比較：從「天表魁偉」到「忘恩負義」、從「漢文、景」到「越王勾踐」，清楚地看見對於雍正形象與評價的分歧。

三、從「大義」到「俠義」

——武俠小說視野下雍正與呂四娘的野史敘事

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

——曾靜《知新錄》，摘自《大義覺迷錄》

在民國的雍正野史中，各單一事件的傳言在完形閱讀之下，漸被收納在描繪雍正生平的「別傳」、「外傳」之中，進而形成與「本紀」對照閱讀的歷史記憶。⁵³有趣的是，在民國初期後來的續衍故事，多將雍正的出身描寫為俠客的形象，形成了一系列的雍正劍俠敘事。如《清宮遺聞》中的〈雍正外傳〉即寫道：「少年無賴，好飲酒擊劍，不

⁵⁰ 參見陳懷編：《清史要略·第二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1925年），頁12-22。

⁵¹ 參見劉法曾：《極盛時期》，第八節「兄弟猜忌」，《清史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14年），頁57-58。

⁵²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28回「小二哥暫充欽差 皇四子大戰俠客」，頁120。

⁵³ 此處「完形」一詞是借用西方格式塔的完形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小說人物從殘缺的、片段式的形象層層發展，除了不斷回應讀者與創作者的期待視野外，事實上也是在「完形」的驅力之下，被重新編織到完整的想像結構之中。

見悅於康熙，出王在外，所交多劍客力士。結兄弟十三人，其長者為某僧，技尤高超，驍勇絕倫。能練劍成丸，藏腦海中，用則自口吐出，夭矯如長虹，殺人於百里之外，號稱萬人敵。刺者能練劍如芥，藏於指甲縫，用時擲於空中，當者披靡。雍正亦習其術。」雍正劍法之高，在描述到其赴天壇祭祀、突聞壇頂異響之時，「惟見雍正右手微動，一線光芒，從手中射出，斯須幕裂處墜一狐首」⁵⁴之事，同條亦以〈世宗之外傳〉與〈胤禛外傳〉分別並記錄在《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與《滿清外史》中。

吳秀良在考察「雍正劍俠」時，說到辛亥革命之後清宮軼聞開始大量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現，這些故事大多基於重新被發掘的書目、文人私家筆記、甚至是充滿神祕的口傳故事撰寫而成，又在情節上與中國傳統的劍俠結合，迅速以「非官方歷史」(unofficial histories)的形式流行於小說市場。⁵⁵從清末民初的雍正野史來看，極有可能是文學市場上流行的「俠風」吹拂之下，匯以《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貪財」、「好殺」、「酗酒」、「淫色」，甚至雍正幼年「喜怒不定」等性格，⁵⁶種種不羈與游於法外的傳言，讓雍正在多部小說之中，皆以俠之形象而出現，形成一時流行的雍正劍俠系列小說。但描述雍正「練劍成丸，藏腦海中」的劍俠形象多未被延續到後來白話系統的創作中，取

⁵⁴ 〈雍正外傳〉，《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頁27。

⁵⁵ 同時吳氏亦指出俠風的流行也與快速擴張的報紙、雜誌等大眾媒體息息相關。參見 Silas H. L. Wu,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1251-1253.

⁵⁶ 如《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234載：「惟四阿哥，朕親撫育。幼年時，微覺喜怒不定。至其能體朕意、愛朕之心，殷勤懇切，可謂誠孝。……是日，皇四子胤禛奏，臣侍皇父左右，時蒙訓誨。頃者復降褒綸，實切感愧。至於喜怒不定一語，昔年曾蒙皇父訓飭。此十餘年以來，皇父未曾降旨飭臣，有喜怒不定之處，是臣省改微誠，已荷皇父洞鑒。今臣年逾三十，居心行事，大概已定。喜怒不定四字，關係臣之生平。仰懇聖慈，將諭旨內此四字恩免記載。內侍梁九功、李玉轉奏出。復傳諭曰，十餘年來，實未見四阿哥有喜怒不定之處，頃朕降旨，時偶然論及，無非益加勉勵之意，此語不必記載。」《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卷235，頁3152-3153。

而代之的是許指嚴《十葉野聞》中〈奪嫡妖亂志七則〉俠僧的形象。〈奪嫡妖亂志〉寫道雍正「漫遊至嵩山，遇少林僧，技擊過人，乃膜拜求為弟子」，⁵⁷並擲一「鐵杖」行游江湖。在上述裡，可看到〈奪嫡妖亂志〉以嵩山的時空和「鐵杖」來標示雍正少林武術淵源。所謂少林武術，要到乾隆年間居福禪師（生卒年不詳）傳授、升霄道人（生卒年不詳）整理的《羅漢行宮全譜》才流行，但晚清小說不同於武技未發達時代，常受各流派武技爭雄的影響，各自構作其情節與武術來源，⁵⁸此亦可能是雍正少林寺習武形象較為流行的原因，也使得〈奪嫡妖亂志〉大部分情節皆在白話形式的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和陳蓮痕《雍正奪嫡》中被敷衍成章，具有其內容與人物形象上的典範意義。

〈奪嫡妖亂志〉、《清宮十三朝演義》和《雍正奪嫡》在內容上有所承繼關係，三者奪嫡案上，皆以描述宮中權力最盛的太子胤礽（1674-1724）與四子胤禛（1678-1735）之間的爭鬥為主，說到其各自養士求僧，驅使「喇嘛爭以魔術自效，而江湖術士、山谷伏莽，咸趨闕下，以求效用。」而胤禛恐其所養死士皆被太子扼殺，便隻身行走江湖，至嵩山少林習武。待雍正從回宮之後，太子隨即派遣刺客進宮行刺。舉《清宮十三朝演義》為例，在述及太子派刺客暗殺時即說道：

祇聽得嗚嗚的聲音夾着一道光芒，從窗外直飛進來，噹的一聲。胤禛（應為「禛」）看時，一柄寶劍，插在床檉上。那劍柄兒兀自幌着，射出萬道寒光來。喇嘛和尚急上去把胤禛一把拉開，又把屋子裏的燈吹熄了。祇聽得院子裏叮叮噹噹，劍柄兒磕碰的聲音。打了半天，那聲音慢慢的遠了。這時候天色也明了，胤禛酒也嚇醒了，開出院子去，一看見院子裏的樹木，被劍削去枝葉，

⁵⁷ 許指嚴：〈奪嫡妖亂志七則〉，《中國野史集成·十葉野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516-517。

⁵⁸ 參見龔鵬程：〈論清代的俠義小說〉，收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頁206-207。

好似一株一株旗杆；滿地倒着屍身，胤禛認得是太子劍客；外屋子也有幾個自己的劍客，被外來的刺客殺死的。

而隔了一晚，胤禛亦派人去暗殺太子：

這一夜，住在皇城相近的百姓們都紛紛出來向大街上買十多具棺木。那雍王胤禛府裏也打發侍衛們出來買了許多棺木抬進去。原來那夜一場廝殺，太子早已探得消息躲藏起來，東宮四下裏都有劍客埋伏着。兩面一場惡殺，各送了十多條性命。從此以後雍王和太子的仇恨愈結愈深。⁵⁹

從故事來看，九王奪嫡的內鬥被聚焦在胤礽與胤禛之間的矛盾，並且轉化為武術與「魔術」⁶⁰的競賽。雖為劍俠，但雍正的形象實不具備晚清俠義小說中忠孝節義的義俠特質，其一身本領皆被投入到宮廷的鬥爭之中，不為公共正義，只納為一己之用；而在後來的《雍正奪嫡》不止重寫二皇子相互鬥劍、鬥法之事，更將其出身描繪成：「這兒子啼聲之中，帶有廝殺之音，雖絕英歲無比，終以為含着暴戾的模樣」，⁶¹一反《清史稿·清世宗本紀》中「天表魁偉，舉止端凝」，充分體現《覺迷錄》曾靜所控訴雍正的「好殺」性格。

對於雍正劍俠的形象塑造，或許可以與《大義覺迷錄》進行對照式閱讀，並進而構成對雍正最有力的批判。以不軌於正義的俠客身分來形塑雍正，除了正面勾勒曾靜所控訴之「好殺」，曾靜在《覺迷錄》中曾批判滿州皇權，說到「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不該把世路上英雄做，周末局變，在位多不知學，盡是世路中英雄。甚者老奸巨猾，即諺所謂光棍也」一語，認為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

⁵⁹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28回「小二哥暫充欽差 皇四子大戰俠客」，頁109-110。

⁶⁰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頁109-110。

⁶¹ 陳蓮痕：《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頁126。

該孟子做，秦以後皇帝該程朱做，而明末皇帝則該呂留良做，但「今都被豪強佔據去了。吾儒最會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那曉得做甚皇帝。」⁶² 儘管在《大義覺迷錄》裡雍正辯之以「天命所歸功德」，而雍正形象不論是在民國以來「練劍成丸」的無賴劍俠，或是於少林習武的執杖武僧皆廣泛流傳，與《覺迷錄》遙相呼應，無異是一種諷刺其得位正統的顛覆性政治修辭術。

必須注意的是，儘管雍正武技高超，且「竊思天下之劍客，多半皆我羽黨，可以無慮」，但小說家卻安排了另一勢力與之抗衡。「呂晚村之女」的報仇行刺及「不得善終」的敘事情節〈雍正外傳〉載：

惟某僧雖不為用，亡走山澤，深以為患，思殺之以除害，而某僧行蹤飄忽，無從弋獲。一日偵在某所，命結義兄弟三人，易服往探，後布精兵圍守要隘。僧睹三人至，笑曰：「若輩受主命來捕我耶？汝主必不能苟免，一月後必有為吾報仇者，汝等識之。」言迄伏劍而死，三人攜其首復命，並以其語復聞。雍正大懼，防衛甚嚴，寢食不寧者數日。月餘，無故暴死於內寢。宮廷秘密，諱為病歿，實則為某女俠所刺。相傳某女俠即呂晚村孫女，劍術尤冠儕輩云。⁶³

相同的安排也出現在《十葉野聞》之中，〈奪嫡妖亂志〉寫道雍正僧師「贈一鐵杖留為他日紀念，且言除一女子外，可持此橫行海內矣」；隔條的〈九漢外史〉亦描述雍正被告知有「女之異能，必為後患」，皆指「與滿人不共戴天」的故明功臣呂晚村孫女「俠娘」。⁶⁴ 有關呂留良之女其確切身分一直未見於諸筆記小說中，一直要到《清宮十三朝演義》與《雍正奪嫡》等較晚期的書才可見到，並被賦予了明確身分：呂四娘。

⁶² 參見《大義覺迷錄》，頁161-162。

⁶³ 〈雍正外傳〉，《清朝野史大觀·清宮遺聞》，頁27-28。

⁶⁴ 許指嚴：〈奪嫡妖亂志七則〉、〈九漢外史五則〉，頁517、520。

在《清宮十三朝演義》與《雍正奪嫡》等後來續衍中，呂四娘的身世皆被擴寫，如《清宮十三朝演義》在敘事中，說到雍正正在曾靜案中對呂留良一門「奇料理」後，其次子呂毅中第四個女兒呂四娘被悄悄地被送至對門口「一家姓朱的家裏」。四娘被朱家收養後，即在朱家練習少林武藝並誓言為父報仇，在與另一女俠魚孃的幫助下，潛入宮中割下雍正的頭顱。⁶⁵而《雍正奪嫡》則將《十葉野聞》中的「且言除一女子外，可持此橫行海內矣」，「除一女子」被設定成是一名名為廣慈的獨臂尼姑，其自言道：

我乃是前明崇禎皇帝的公主呢，因為當初先皇考給李自成逼破神京，萬分危難中，本想把我殺死，只因手軟乏力，砍掉我的一臂。……後來聽得國破家亡，先皇考自縊身死，滿州入關，竊據神京。我便入山學道，遇見異人，傳有這般劍術武藝。⁶⁶

而四娘即在廣慈的指導下，學成亦入宮「手刃暴主」。在上述文本中，呂四娘原為明遺民呂留良之血脈，《清宮十三朝演義》卻又安排其進入「朱」家，以明朝「國姓」來拉抬四娘的身分，將其從遺民呂氏之女變為皇室朱家之女；比較起來，《雍正奪嫡》雖非套以國姓的框架，但卻將四娘納入明思宗（1611-1644）之女廣慈的門下，具有相似的邏輯，皆將呂四娘女俠的身分自我脈絡化到明朝；女俠的身體被轉化為明之國體，顯示了在呂四娘行刺雍正的敘事背後，牽連著清末民初文人對於明／清、漢／滿、華／夷等正統性問題的辯證思考。

王德威曾指出晚清的俠義小說，是古典說部俠義和公案兩種模式的合流，混合了廟堂與江湖的活動場景，僭越各自界線，在兩種文類的融合下，「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核心處，仍舊保留著對皇權的稱

⁶⁵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36回「破好事大興文字獄 報親仇硬拆鸞鳳儔」，頁38-39。

⁶⁶ 陳蓮痕：《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頁183。

頌，並以之爲人間正義的最終裁判。」⁶⁷但同樣處理廟堂與江湖的混合時空，在《清宮十三朝演義》、《雍正奪嫡》及其後的《呂四娘演義》，可以看見的，卻是向古典說部俠義的嚴重傾斜：其保留了俠義小說主張懲善揚惡，以及對現存秩序進行潛在批判的文類力量，而非公案小說中奉行國家權力，對現存律法加以肯定的思想。晚清俠義小說中作爲最終裁判的「人間正義」，在《清宮十三朝演義》、《雍正奪嫡》與《呂四娘演義》等中已非官方的力量，而是在國家體系之上的種族與文化「大義」，此處已將文化與種族問題轉移到官僚體系問題之上，「義」之意義已產生裂變；如《呂四娘演義》第一回「明大義雍正頒書 偽設誓張熙中計」中，開篇言明雍正之大義爲不可反叛作亂「忠君親上的道理」，但在漢人的視界裡，小說又說到應對胡人「則以大義、勸以反戈舉義」，在「忠君」與「反戈舉義」之間，明顯站在後者立場。⁶⁸《雍正奪嫡》與《呂四娘演義》等與「爲皇權而創作」（王德威語）的晚清俠義小說最大不同之處，在於晚清如《七俠五義》等，內容是處理俠客與官員之間的互動，在不可超越的「皇權」保護／監視之下，公共正義皆可放在具有等級序階的社會之中；而《雍正奪嫡》與《呂四娘演義》則其面對「帝王」問題，劍俠胤禛與女俠呂四娘則旨在逾越與超越皇權。雍正作爲劍俠的形象，已被泯除了詩禮建構下的王者風範，替之以「無賴」、「好殺」與「世路英雄」的特質，變成了傲視權威、我行我素的界外角色；而女俠呂四娘則被塑造成用以突破既有權力的裂隙，以俠之正義，取代雍正統治國

⁶⁷ 王德威指出所謂「公案」與「俠義」無論在主題來源、情節結構，以及意識形態定位皆相去甚遠，具有意旨上的張力。「當俠義小說中的正義得以伸張之時，官方的話語卻可能出現裂隙，因其用以懲治爲非作歹者的措施如此暴烈，往往瀕於非法。俠義小說以懲惡揚善爲名放縱的暴力與混亂，正是公案小說以同樣懲惡揚善的名義，所懼怕以及所欲平息的。」參見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虛張的正義——俠義公案小說〉，《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頁163-164。

⁶⁸ 陳蓮痕：《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第1回「明大義雍正頒書 偽設誓張熙中計」，頁1、7。

家的「大義」。

在清末民初呂晚村孫女刺殺雍正的續衍發展中，最後以呂四娘殺害皇四子胤禛，以「四娘」殺「四子」，幾乎可以推斷「呂四娘」身分的形塑是因應雍正而生，體現了灼然的諷刺意味。雍正的劍俠與呂四娘女俠的塑造，除了折照雍正的歷史事件外，亦具有符合文學潮流與雙重意義。呂四娘從早期的「呂晚村孫女」演變到後來的呂氏家族第四女，其形象同宋、元、明以來文人筆下的女俠形象之發展，被賦予了「神祕性」與「人間性」。⁶⁹ 四娘除了涉入江湖外，在《清宮十三朝演義》中，小說家安排其與收養四娘的朱家之子蓉鏡成爲夫妻，從養女身分轉爲朱家媳婦；而《雍正奪嫡》則選擇讓四娘與被雍正誅殺的年羹堯之子年壽結親。兩部小說除了延續殘缺的朱家與年家香火，更將「女俠」收編到中國傳統的「賢妻」等身分，延續自唐宋小說即有的，夫得妻助之發跡變泰的套語結構。

從呂四娘「賢妻」與「女俠」等雙重性來看，此類身分除了是承化自中國古典小說的女性形象外，事實上也暗合於中國近代思潮；「賢妻」與「俠女」的身分特質看似衝突，但兩者皆伴隨著對傳統女性的顛覆與批判。以縈繞近代大東亞的「賢妻良母」論觀之，晚清重新挪用傳統「賢母」、「良妻」的角色，在甲午戰後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重新形塑了出走閨閣，並貢獻社會、國家的新賢妻良母；⁷⁰ 而呂四娘在小說中扮演的賢妻亦是維繫「家族——國家——國體」複合結構的重要關鍵。至於「俠」何以爲女子而非男子？考察清末民初時期喜歡回顧明末女傑，將女性遠離了紅顏薄命的傳統形象，突

⁶⁹ 參見林保淳：〈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女俠」形象〉，《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1997年9月），頁43-88。

⁷⁰ 如同陳延濶的考察，「賢母」、「良妻」自先秦典籍即存在，而近代「賢妻良母」的詞彙與論述則要至近代才正式出現，並試圖顛覆傳統儒教的婦女形象。相關研究見陳延濶：〈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果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0卷（2002年12月），頁199-219。

顯其英雄氣壯等豪傑烈女之性格，如秦良玉（1574-1648）、沈雲英（1624-1660）等。原因除了有「非有女子組織其間，則了無興味」的作意好奇與遊戲文章外，亦有「清初相傳多俠女，蓋專制殺戮之戾氣所激而成」（許指嚴語）等看法。⁷¹ 除此之外，晚清報刊在中國民族存亡的議題中，曾就女性建構自我主體性的技術問題（a technology of the female self）開展。此時期將女性（womanhood）和民族性（nationhood）交疊重合，一連串如花木蘭、梁紅玉（1102-1135）等歷史或虛構女性人物被形塑為高舉「保我民族」與「助我殺異種保同種」旗幟的「尚武女英雄」的模範想像。⁷² 如將呂四娘作為民族建構的女性角色，作為跳脫社會與身分常規的形象化表現，劍俠雍正以「好殺」形象從廟堂出走江湖，悠遊於法外世界；而呂四娘作為劍術上不可超越之力，其行刺雍正一事，除了能對抗其「殺戮之戾氣」外，以陰性對抗陽剛的敘事表現亦象徵著以明抗清，以「俠義」來論辯《覺迷錄》中所涉及的滿漢、華夷等「大義」的序階；成功地將《覺迷錄》裡雍正皇帝對曾靜的口誅筆伐，替換為呂四娘斬殺雍正之劍，並寄託了正義與秩序回歸的集體想像。

四、身體政治學：雍正續寫故事中的身體與國體

重重寒氣逼樓臺，深鎖宮門喚不開。寶劍革囊紅線女，禁城一嘯御風來。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

雍正的續衍故事多與雍正朝文字獄案的野史共振，除了曾靜與呂

⁷¹ 參見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261-288。

⁷² 季家珍著，曹南平譯：〈擴充女性／國族的想像：晚清婦女期刊中的社會女英雄及女戰士〉，收於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54-78。

留良案外，最著名者即為查嗣庭（？-1727）案。《清朝野史大觀·清朝史料》載〈查嗣庭試題之狀〉，說到雍正四年（1726）查嗣庭為江西正考官，出試題「維民所止」；後有訐者謂「維止」二字，是取「雍正」二字去其首的意思。此說一出雍正即勃然大怒，最後以「逆天負恩，譏刺咒詛，大干法紀」之名革職拿問。⁷³「維民所止」在當時時候被判定為對雍正的咒詛，卻諷刺地在晚清小說中被認作雍正即將被斬頭的預視。此樁文字獄案在晚清時仍可見到，卻鮮少被挪用於後來續衍的小說中，但晚清以來對於雍正被斷頭的想像始終繚繞於民間，最後落在小說中，將雍正斷頭的死狀訴諸情節。⁷⁴

從民國出版的《清朝野史大觀》來看，早期的筆記故事如〈世宗晏駕之異聞〉、〈被刺時之確證〉與〈胤禛不得令終〉在言雍正之死時，僅說有呂留良孫女入宮行刺，但行刺過程並沒有多加說明，這也對後世讀者留下許多空白並產生出許多歧異的想像填補其中。如《清史通俗演義》說道：「雍正以後妃嬪侍寢，須脫去袒衣，外罩長袍，由宮監負入，復將外罩除去，裸體入浴。據清宮人傳說，這不是專圖肉慾，乃是防備行刺」，而雍正之死即有可能是呂四娘潛入宮中，假扮後妃後才進行刺殺。⁷⁵但對於四娘以何種方法刺殺雍正，始終未見於早期的筆記故事。

考察民國歷史演義小說，較早反映呂四娘砍下雍正頭顱者，為陳蓮痕的《呂四娘演義》。內容鋪陳了雍正巧遇一吹笛宮娥，當雍正知為新入宮的秀女後，即安排該女子侍寢；呂四娘在得知消息後，即假扮該女接近雍正，最後割下雍正的首級躍出宮外。《呂四娘演義》同《清史通俗演義》一樣，以「妃嬪侍寢」來交代呂四娘接近雍正的手

⁷³ 參見小橫香室主人：〈查嗣庭試題之獄〉，《清朝野史大觀·清朝史料》，頁221-222。

⁷⁴ 參見 Silas H. L. Wu,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1242-1243.

⁷⁵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第33回「畏虎將準部乞修和 望龍髯苗疆留遺恨」，頁215。

段，但在後來的續衍中，小說家們卻選擇拿掉了此一情節，將敘事重點放置在雍正被砍頭的情狀，如《清宮十三朝演義》寫道皇帝原在燈下翻閱奏章，忽然院子裡梧桐上飛過兩道白光，等到宮女回神時，發現皇帝已倒在地上，「腔子上腦袋已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了」。當眾人拿著燈火四處找尋雍正的腦袋時，「還是惠妃在屍首的褲襠裏找到了。那惠妃捧著雍正皇帝的腦袋嗚嗚咽咽的哭得十分淒涼」。⁷⁶許嘯天在雍正死狀的敘事中增添了許多細節，設計雍正的頭顱被放置在褲襠中，在故事裡原「四娘割下皇帝的頭來，意欲帶他回去在祖父父親墳前祭祀」，但幫助四娘行刺的魚孃卻說：「這反較人看出痕跡來，不如不拿去的好」，「便把雍正皇帝的頭拿來塞在屍首的褲襠裏，兩人相視一笑，便一聳身出了圓明園」。⁷⁷此處被四娘割去的並非單純肉體性的頭顱，更象徵著對滿人政權與文化的精神性去勢與閹割，也是小說家對雍正之死的訕笑。相較於《清宮十三朝演義》的邪謔性，《雍正奪嫡》則以砍頭來突顯了故事中的忠義文化，說到其與年壽一同行刺：

呂四娘便把雍正皇帝的腦袋，藏在囊中，和年壽出宮。回到峨眉山，廣慈見著不覺大喜，便設了四個靈位，一是崇禎皇帝，一是呂留良，一是呂葆中，一是年羹堯和年氏家人，把雍正皇帝的腦袋置在靈位前面，向空遙祭了一番。

在陳蓮痕的筆下，這場以雍正頭顱祭祀的儀式背後，實輻射著四重意義，分別是憑弔故國、撫慰遺民、告祭祖先和為忠臣平反，以砍頭與祭祀進行了忠義文化的秩序重整與回歸。而祭拜完靈位後，在廣慈的主持下，呂四娘和年壽便被撮合為夫妻；另一方面，在宮裡發現了被砍頭的雍正皇帝後：

⁷⁶ 參見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38回「弓鞋到處天子被刺 手帕傳來郎君入彀」，頁57-58。

⁷⁷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第38回「弓鞋到處天子被刺 手帕傳來郎君入彀」，頁60-61。

當然驚慌的了不得，忙的報於皇后知道。皇后傳旨，把宮內詳細搜查，那裡還有刺客的影子！但恐張揚出來，不很方便，便把雍正皇帝的屍身上面，配了一顆黃金雕成的腦袋，只得棺殮起來，下詔說是因病駕崩的。後來民間雖有些知道內中隱情的，但畏著專制淫威，也沒人敢大膽說的了。⁷⁸

面對殘缺的屍身，清宮只能無力地選擇以彷彿義肢般黃金頭顱重新替屍體接上，以求表面地完整。黃金頭顱即使精雕細琢、華貴隆重，但終究不過是偽作與替代，傳聞中雍正頭顱的真／偽曖昧之間，亦寓有思考政權真偽的況味。

在雍正野史的敘事中，殘缺的肉身一直富含著政治與文化意涵。從曾靜與呂留良的文字獄案中，即可見到雍正對於呂留良一家的「奇料理」即是一項政治操作。該文字獄案裡，叛國的呂留良與呂葆中被責以開棺戮屍的事件，一直在小說中持續被召喚，並被增添了許多表演性。⁷⁹除了戮屍外，考察《雍正奪嫡》中的獨臂神尼廣慈，其形象應是從《明史》中所載長平公主（1629-1646）的直接挪用，但其斷臂本身就直接牽涉到亡國事件，具有形象的特殊意義。⁸⁰此種肉身政治，在後續衍異的「砍頭」書寫上更加被深化，除查嗣庭案外，雍正與頭顱相關的野史還有「唯一殺人的利器」的血滴子，其功用正是奪取敵人首級用，《呂四娘演義》說到「雍正帝好以血滴子取人首級，後來自己的首級亦被人取去，無從考察。這豈不是天道昭彰麼？」⁸¹

⁷⁸ 陳蓮痕：《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第26回「俠女子手刃暴主」，頁184。

⁷⁹ 如《雍正奪嫡》裡皇上下令將屍身從棺材中倒出來砍頭，但棺材的屍身卻同生人從未爛掉，和殺活人一樣。陳蓮痕：《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第5回「無妄災文字賈禍」，頁134。

⁸⁰ 參見《明史·公主列傳》，卷121：「長平公主，年十六，帝選周顯尚主。將婚，以寇警暫停。城陷，帝入壽寧宮，主牽帝衣哭。帝曰：『汝何故生我家！』以劍揮斫之，斷左臂。」（清）張廷玉等編：《明史·公主列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卷121，頁30333。

⁸¹ 孫劍秋：《劍俠呂四娘演義：清朝第一女俠》，第14回「殺同氣煎豆苦熬

即是對雍正死狀的一大嘲諷。

陳平原在研究武俠小說時提及「魯迅等新文學家曾再三抨擊將『看殺頭』作為樂趣的中國人，除了嘆息大眾的愚昧外，更震驚於其『嗜殺戮』。」⁸² 指出了此種嗜好與快感可能在武俠小說的創作與閱讀中獲得替代性滿足。在雍正野史的敘事中「砍頭」或許滿足了看客「嗜殺戮」的耽溺心理，但將其放在同時期的小說中考察，無論是血滴子或是雍正死狀的敘事，實構成了一種王德威所指稱的，充滿政治教化意義的「砍頭情結」(decapitation syndrome)。王德威指出在晚清憂患餘生（本名連夢青，生卒年不詳）的《鄰家女》到魯迅以降的現代文學中，砍頭已超出了身體斷裂的意義，其象徵著家國意義系統的崩潰。⁸³ 野史中雍正的特務部隊以血滴子奪人頭顱，同《鄰家女》中的金不磨，其以野蠻暴力取代君主應實行的道德教化，「每一個斷頭都代表了為政者對百姓最殘酷的背叛，每一顆頭顱都見證了一個文明體系內部的矛盾與潰散」。⁸⁴ 從《呂四娘演義》、《清宮十三朝演義》與《雍正奪嫡》來看，正是在面對家與國的雙重壓迫之下，呂四娘奮起拔劍，以暴力克制暴力，形成了種族文化與政治上的血腥辯證。

雖然王德威認為砍頭的身體政治書寫是在於清末民初之際興起，但或許我們對於砍頭的記憶可以再上推至明末清初之時。清代入關之後嚴格實行薙髮令，以留髮／留頭的生存選擇迫使百姓進行文化上的強制認同。頭顱的議題在清代皆被突出，帶有種族本質論的華夷之

其 滅刺客離筵置毒酒」，頁 127。

⁸² 陳平原認為「出於文明社會理論規範的壓力，作家和讀者都不得不將殺人行為道德化。即使所殺卻為惡人，能於殺人行為中得到無窮樂趣者，都無法掩飾其潛藏的嗜血欲望。這種未必美好的欲望，在現實生活中受到理性和法律的抑制，而在武俠小說的創作與閱讀中，可能得到某種替代性的實現。」參見氏著：〈武俠小說、大眾潛意識及其他〉，《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44-245。

⁸³ 參見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頁17-55。

⁸⁴ 參見王德威：〈「頭」的故事：歷史·身體·創傷敘事〉，頁23。

辨漸漸轉向為頭顱、薙髮等身體符號之別。儘管在乾隆朝以後，大眾普遍適應此種裝扮，但髮式始終是社會與種族的尖銳問題。⁸⁵而在晚清折照晚明之際，薙髮令的恐懼仍然縈繞在群眾之中，晚清胡蘊玉的〈髮史〉即是記錄不願蒙「辮髮之恥」的人，使「故老遺賢精魂不滅」。其在序言道：「吾民族蒙辨髮知恥，至於今已二百六十八年矣！習以為常，安之若素，幾自忘固有之頭顱」，⁸⁶頭與髮兩者實不能割裂來看，皆具有濃厚的文化意義。除薙髮外，漢人在認知滿、漢間頭顱之差異也有一套辨別原則。從《滿清野史》中〈滿州頭顱之異〉來看，滿人舊俗因讓幼兒「仰寢」、「以石壓頭」，如將清太祖、太宗「試諦審其頭顱，皆作扁圓狀」，「滿族之異於漢族，但一望其頭顱，以灼然可見矣」。⁸⁷晚清已鮮見「鳳凰來儀」⁸⁸等明遺民常用的意象，取而代之的是「頭——髮——國」這肉身、文化與政治的共構符號。從文化成規的角度來看，「頭」的敘事在滿漢、華夷衝突的文化場域之中，被濃縮為一種套語與藝術記憶／技藝；薙髮令與頭顱之異等成爲了《呂四娘演義》與《雍正奪嫡》的前置文本，以此背景襯托呂四娘砍下雍正頭顱的敘事，更能了解到故事背後除有殺父之仇外，更背負滅國的報復。

最後，必須再補充一點。或有論者認爲雍正砍頭敘事應與蒲松齡（1640-1715）《聊齋志異·俠女》有承衍與影射關係。⁸⁹〈俠女〉一則

⁸⁵ 可參見〔美〕孔飛力（Philip A. Kuhn, 1933-）著，陳兼、劉昶譯：《魂魄：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⁸⁶ 胡蘊玉：〈髮史·序〉，《滿清野史·正編二十種》。

⁸⁷ 胡蘊玉：〈滿州頭顱之異〉，《滿清野史·正編二十種》，不著頁碼。

⁸⁸ 如呂留良的日記寫道河南有鳳凰飛至，百鳥皆來朝會。數日有二長丈許的赤鳥以身體遮蔽鳳凰。史景遷指出：「呂留良那時的漢人皆知，朱紅代表前明，而鳳凰飛至則是世有遞嬗的先兆。」於是呂留良在日記後又作〈鳳視銘〉：「德未嘗衰爾，或不來善。以道鳴必聖人生。」參見〔美〕史景遷著，溫治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頁86-87。

⁸⁹ 如于平指出的《闕名筆記》等，參見于平：〈俠女與呂四娘孰先孰後〉，《蒲松齡研究》，「創刊三十期紀念專號」（1998年4月），頁138。

描述「妾浙人，父官司馬，陷於仇，被籍吾家」，以及其斬殺仇人頭顱「鬚髮交而血模糊也，駭絕」，皆與後來呂四娘的背景與事蹟具有相似性。但經考察，呂四娘斬頭之故事應為清末民初時期才被形塑而成，即使兩者之間有承襲關係，呂四娘故事經過民國文人不斷地細化與衍異，四娘所提的雍正頭顱已非《聊齋志異·俠女》所言的「仇人頭爾」而已，⁹⁰ 而是充斥著對雍正與滿人政權的諷刺性與反動性文化意義。

五、在嚴肅與遊戲之間 ——帝王野史敘事與另一種「國故」論述

在論及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時，王汎森（1869-1936）曾舉章太炎（1869-1936）為例，說到：「地方與民族，基本上還保存一套與官方不同的歷史記憶的版本。那麼，清代歷史中除了士大夫所奉行的官方正統之外，似乎還有一個隱藏的潛流。在兩、三百年間，這一歷史記憶層，像陸塊般始終存在，它們要得到適當機會才會冒出來」。⁹¹ 隨著民間記憶的復返，知識分子自覺地將大清國客體化，意識到深仁厚澤的黃帝非我族，大清國亦非我國，一套關乎「國魂」、「國粹」、「國故」等重塑傳統的論述於焉展開。關於章太炎與恢復保存民族共同歷史記憶的國粹運動極其複雜，不乏學者的精采論述，但實非本文關懷焦點。值得進一步探問的是，除了菁英式、國粹式、關乎國族與「國故」之外，能否再開掘出另一種大眾式、通俗式的國故論述？

⁹⁰ 《聊齋志異》的異史氏曰亦非將故事重點置於女俠復仇的詮釋，寫道：「人必室有俠女，而後可以畜變童也。不然，爾愛其艾豨，彼愛爾婁豬矣。」參見（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臺北：藝文出版社，2006年），頁61。

⁹¹ 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34卷第3期（1996年9月），頁15。

在帝國消逝之際，「國」之重新釐定與過去歷史與傳統的發現與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息息相關，南社柳亞子（1887-1958）在《清秘史·序》說道：「夫唯中國有史，而後人人知秉特權、握高位者之為匪我族類。唯胡族有史，而後人人知鳥獸行者之不可一日與居。雖有盲史，亦不復能以雙手掩盡天下目矣」。⁹²又以章太炎為例，朱希祖（1879-1944）曾說到章太炎回憶十一、二歲時，偶聽外祖朱左卿（生卒年不詳）講蔣良驥（1723-1789）《東華錄》、曾靜案等事件即為其反清的源頭之一；⁹³此事件在章太炎的思想脈絡裡，種下了「倒滿」的漢種意識，並催使其對與清代官方相抗衡的歷史記憶實行招魂。使被官方說法遮蔽的盲者復見，或如章太炎對漢種歷史輯佚的過程，一方面是對過去官方建構之歷史的去魅化，另一方面在不斷增強了國族式、漢種式的反清意識與認同。薙髮、雍正、曾靜案等作為歷史事實，在清末民初的語境裡，其混雜在各階層知識分子的歷史記憶之中，是為一種各階層共享的歷史資源，流動在各階層與各文類的文學表現。

處理上述議題，如將章太炎等的國故與通俗野史傳聞的輯佚、創作對照，因而推論歷史記憶的建構過程分為菁英／通俗、嚴肅／遊戲等二元對立又未免失之草率。民國初期，關於清史的通俗著述相繼出現，或有學者認為雍正奪嫡、太后下嫁、順治出家等野史敘事顯示民眾以漢人尊夏攘夷觀痛詆清朝皇室的腐敗無能，為迎合市民談趣心理的創作。⁹⁴但相關野史就像魯迅（1881-1936）所說的：「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卻可以較分明，因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⁹⁵對魯迅而言，「野史」之「野」或許

⁹² 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頁30。

⁹³ 朱希祖：〈本師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蹟筆記〉，《制言》第25期，1939年6月，頁1。

⁹⁴ 馮爾康：《雍正傳》，頁637-638。

⁹⁵ 魯迅：〈讀經與讀史〉，《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象徵被「塗飾」的、等待被考掘的國民性，連結著一個民族的文化心理。⁹⁶晚清演義小說家按政治小說的標準和要求裁剪正野諸史，從而與「新民」論述接應，使有利於「新民」的新聞性、紀實性壓倒了「歷史」的文獻性，展現一股「演義救國」的風潮。回到雍正相關敘事來看，關於雍正的野史大量在晚清大量復出，其負面記憶的被召喚攸關著民間對於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的反動；這些野史或如蔡東藩（1877-1945）《清史通俗演義》所言「擇善而從，不善則改」⁹⁷的濃厚史鑑意識；或是在集權統治之下，如《呂四娘演義》所寫到的：「壓力越重，反抗力越大。偏有一輩不怕死的漢人依然奮筆著書」的民族「傷心史」。⁹⁸在這些故事之中，書寫的歷史事件皆為表層記憶，深層記憶卻隱然寓有對於滿漢、華夷更深的批判，甚至是「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砍頭創傷記憶。

在思考清末民初的野史敘事的遊戲與嚴肅之間，武俠的形式也應列入其中，尤其晚清對於「俠」的思考往往與國民性、國族性息息相關。武俠小說同其他大眾文學形式，除了體現當代的審美趣味，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大眾的潛在欲望。⁹⁹在面對晚清政府的失敗，大眾多記憶過去反清志士的事蹟，尋求心靈的慰藉。如在民國17年左右推行的常杰森（1875-1929）《雍正劍俠圖》，¹⁰⁰該書即描繪雍正時代

第3卷，頁138。

⁹⁶ 周憲秀在觀察魯迅與野史的關係時，認為：「他（魯迅）研究野史，是和研究國民性聯繫在一起的。他把對社會現實觀察所得知從野史研究的啓發結合起來，形成了具獨特色彩的改造國民性的思想。他論證改造國民性的問題，往往是從野史中尋求論據的。」參見周憲秀：〈魯迅與野史〉，《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04年3月），頁60。

⁹⁷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第1回「溯往事慨談身世 述前朝細敘源流」，頁2。

⁹⁸ 孫劍秋：《劍俠呂四娘演義：清朝第一女俠》，第1回「明大義雍正頒書偽設誓張熙中計」，頁2。

⁹⁹ 參見陳平原：〈武俠小說、大眾潛意識及其他〉，頁245。

¹⁰⁰ 常杰森著，燕雨石點校：《雍正劍俠圖》（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

五百七十多位俠士、豪傑與異人，不少角色即出自真實歷史上的反滿人物。¹⁰¹ 在清末民初時期，雍正劍俠的形象從《清宮遺聞》、《十葉野聞》等筆記故事的基礎上，積累成《清宮十三朝演義》、《雍正奪嫡》等長篇，這些文本的「滿足了自我犧牲的英雄情結與對清政府垮台的寄託，而雍正即是作為負面性與古代惡人的完美角色」。¹⁰² 雍正及呂四娘的故事在文人的筆下不斷地重演，皇帝被降格諷刺為劍俠，其「文治」被集體遺忘；在漢種的創傷記憶之中，民間又創造新的女俠以「俠義」之武功，取代雍正、官方所宣稱的「大義」。在不斷地「演義」背後，除了是歷史發展的普及外，於創作與閱讀中更再現了小說具教育、道德、國族意義的歷史觀。¹⁰³

相較於菁英知識分子，皇權、王宮位於一般大眾不可觸及的高處，而民間自有其對於王朝內部的認識之道。以雍正故事為例，歷史事件作為想像的種子，在集體記憶之中不斷成長茁壯，儘管民國時期雍正故事在通俗文學市場裡頭，多以通俗演義與武俠小說形式敷衍，具有閱讀趣味與市場的商業考量，即可能如同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所言的：當主奴關係根深在群眾之中，經由不斷再現的結果，其批判性反而被削減，反而被突顯的是表演性質；或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社會學理論中所指稱，是一種文化的慣習（habitus）。但同周蕾所指出，「社會」、「偵探」、「宮闈」、「武俠」等鴛鴦蝴蝶派小說，在文學遊戲背後，本質仍混雜著文化種族、意識形態與教條主義。¹⁰⁴ 如詳細觀察清末民初的雍正故事，背後除在

¹⁰¹ 吳秀良考察《宮中檔雍正朝奏折》時說道：世宗在曾靜案後非常小心南方沿海的反清秘密活動，當中的反清人物即被挪用到《雍正劍俠圖》的書寫當中，參見 Silas H. L. Wu,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1231-1232.

¹⁰² 參見 Silas H. L. Wu,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1251-1252.

¹⁰³ 林保淳：〈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小說的「虛」與「實」〉，《漢學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頁265。

¹⁰⁴ 周蕾：〈鴛鴦蝴蝶派——通俗文學的一種解讀〉，周蕾著，蔡青松譯：《婦

續衍、闡釋、遊戲等筆法中凝結為對帝王的集體記憶外，更體現大眾面臨民族危機時的歷史意識和興亡感。在通俗文學的創作與閱讀裡，實也構成另一種通俗史觀與充滿民間性格的「國故」敘事。

六、結語

在論述清末民初的集體記憶與想像、甚至是雍正野史的大量出版與其中的民族與滿漢衝突時，我們很難忽略班納迪克（Benedict Anderson, 1936-）早已指出早期資本主義中的印刷品—商品（print-as-commodity）為形塑「水平—世俗的，時間—橫斷的」（horizontal-secular, transverse-time）共同體概念的因素，亦為國族想像的關鍵。如將班納迪克考察的西方案例置換到中國清末民初的文學語境之中，此說似乎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晚清時期的印刷產業不僅以口語語言創造了大眾統一交流與傳播的場域，也創造了與舊式王朝與宗教共同體不同種類的權力語言。¹⁰⁵ 隨著被囚禁在晚清官方文字獄的歷史記憶的復返，不僅填補了史料上的空白，「除了填補它，也可能是提醒原來被壓抑在意識底層的一些稀薄的東西。它們的重現，形成一股越來越強的記憶資料，對當前異族政府造成顛覆批判的作用。」¹⁰⁶

本文認為清末民初的大量出版的雍正野史敘事對於形塑雍正帝的歷史記憶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大眾集體記憶對於雍正的形象遊走於正史／野史之間，亦形成正統／奪位的相互辯證。首先以清末民初的雍正野史與武俠敘事為對象，觀察集體記憶如何繼承、改造、想像與重編歷史事件，種種負面傳言，皆能顛覆對雍正《大義覺迷錄》以來所建構的王位正統與史書正統，寓有滿漢之爭、華夷之辨的教化性。

女與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頁124-125。

¹⁰⁵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37-46.

¹⁰⁶ 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頁3。

其次，民國建立後，武俠小說的發展日益蓬勃，尤其在1920之後達到高峰，進而成為承載甲午戰後「國魂」與「尚武」等精神之媒介。而雍正敘事亦被納入此框架中進行書寫，我試圖從其中觀察出「大義」到「俠義」的線索，討論雍正與曾靜對於大義議題的一來一往之辯駁，如何被轉化為俠與俠之間的恩怨爭鬥，並以呂四娘「四娘」殺「四子」的隱喻來尋求文化種族的正義。第三，以雍正遭到砍頭的敘事為主，分析作為清代國體象徵的頭顱如何在民國文人的想像中，以象徵明朝的軀體呂四娘對清朝進行閹割，構成了小說當中的身體政治學。最後，薙髮、雍正、曾靜案等作為歷史事實，在清末民初的語境裡，其混雜在各階層知識分子的歷史記憶之中，是為一種各階層共享的歷史資源，流動在各階層與各文類的文學表現裡，本文亦試圖思考通俗歷史小說與大眾記憶如何挪用歷史資源，並形成遊戲性與嚴肅性兼具的另一種國故論述。

附表：雍正野史相關書目

| 篇名 | 作者 | 出版資料 | 初版年 |
|-------------|--------|---|------|
| 清史纂要 | 劉法曾 | 上海：中華書局，1914年。 | 1914 |
| 清世宗襲位之異聞 | 小橫香室主人 | 《清朝史料》，《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1915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 | 1915 |
| 清代骨肉之慘禍 | | | |
| 兄弟鬩牆 | | | |
| 胤禛慘死 | | | |
| 年羹堯擁立世宗功 | | | |
| 世宗晏駕之異聞 | | | |
| 雍正外傳 | | | |
| 清史通俗演義 | | | |
| 剃髮之令 | 小橫香室主人 | 《清朝史料》，《清朝野史大觀》，上海：中華書局，1915年；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 | 1915 |
| 查嗣庭試題之獄 | | | |
| 曾靜、呂留良文字之獄 | | | |
| 呂留良獄之取具各省結狀 | | | |
| 呂留良之羽翼 | | | |
| 呂留良獄株連之終結 | | | |
| 曾靜之寬宥 | | | |
| 竊改遺詔之真相 | | | |
| 血滴子器具之製造法 | | | |
| 被刺時之確證 | | | |
| 殺人化灰之利器 | | | |
| 世宗之外傳 | | | |

| | | | |
|----------------|-----|--|------------|
| 胤禛竊詔改竄 | 胡蘊玉 | 《滿清外史》，《滿清野史二十種》，成都：昌福公司，1920年；臺北：新興書局，1983年 | 1920 |
| 血滴子之猛厲 | | | |
| 胤禛不得令終 | | | |
| 胤禛外傳 | | | |
| 奪嫡妖亂志七則 | 許指嚴 | 《十葉野聞》，《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 1920 前後 |
| 清宮歷史演義 | 許慕羲 | 武漢：武漢古籍書店，1985年。 | 1924 |
| 清史要略 | 陳懷 |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部排印本，1925年。 | 1925 |
| 劍俠呂四娘演義：清朝第一女俠 | 孫劍秋 | 上海：益新書社，1925年。 | 1925 |
| 清宮十三朝演義 | 許嘯天 | 上海：國民圖書公司，1925年； 上海：新華書店，1948年。 | 1926 |
| 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 | 陳蓮痕 | 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1935年；《清宮四大醜聞》，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 | 1935 |

徵引書目

《制言》

(清)《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

(清)《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聯出版社，1964年。

(清)《大義覺迷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

(清)《雍正硃批諭旨》，臺北：文海出版社，1965年。

(清)小橫香室主人：《清朝野史大觀》，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

(清)王先謙：《東華續錄》，臺北：大通書局，1968年。

(清)張廷玉等編：《明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臺北：藝文出版社，2006年。

[美]孔飛力著，陳兼、劉昶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北京：三聯書店，2012年。

[美]史景遷著，溫洽溢、吳家恆譯：《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美]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年。

于平：〈俠女與呂四娘孰先孰後〉，《蒲松齡研究》，「創刊三十期紀念專號」，1998年4月，頁137-144。

中央研究院歷史文物陳列館藏：《明清檔案》。

王汎森：〈清末的歷史記憶與國家建構——以章太炎為例〉，《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第34卷第3期，1996年9月，頁1-18。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

5期，頁136-147。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臺北：麥田出版社，2011年。

王鍾翰：〈清世宗奪嫡考實〉，《燕京學報》1949年第36期，頁205-262。

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文獻特刊》，臺北：臺聯國風出版社，1967年。

朱維錚：《重讀近代史》，上海：中西書局，2010年。

汪榮祖：〈記憶與歷史：葉赫那拉氏個案論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期，2009年6月，頁1-39。

周蔥秀：〈魯迅與野史〉，《江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7卷第2期，2004年3月，頁21-28。

周蕾著，蔡青松譯：《婦女與中國現代性》，臺北：麥田出版社，1995年。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年。

林保淳：〈中國古典小說中的「女俠」形象〉，《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1期，1997年9月，頁43-87。

林保淳：〈通俗小說的類型整合——試論金庸小說的「虛」與「實」〉，《漢學研究》第17卷第1期，1999年6月，頁259-283。

邵東方：〈清世宗《大義覺迷錄》重要觀念之探討〉，《漢學研究》第17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61-89。

金承藝：〈胤禛、非清世宗本來名諱的探討〉，《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8期，1979年10月，頁131-158。

金承藝：〈胤禛：一個帝夢成空的皇子〉，《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

- 第6期，1977年6月，頁95-122。
- 金承藝：〈從「胤禛」問題看清世宗奪位〉，《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第5期，1976年6月，頁189-222。
- 金恒源：《正本清源說雍正》，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
- 阿英：《晚清小說史》，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09年。
- 胡蘊玉：《滿清野史·正編二十種》，成都：昌福公司，1920年；臺北：新興書局，1983年。
- 夏祖恩：〈「清代野史」的史學地位初探〉，《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1期，頁101-106。
- 孫劍秋：《劍俠呂四娘演義：清朝第一女俠》，上海：益新書社，1925年。
-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俠與中國文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3年。
- 常杰森著，燕雨石點校：《雍正劍俠圖》，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5年。
- 許指嚴：《中國野史集成·十葉野聞》，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
- 許嘯天：《清宮十三朝演義》，上海：國民圖書公司，1925年；上海：新華書店，1948年。
- 許慕羲：《清宮歷史演義》，武漢：武漢古籍書店，1985年。
- 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 陳延媛：〈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果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10卷，2002年12月，頁199-219。
- 陳蓮痕：《清宮四大醜聞》，北京：群眾出版社，1993年。
- 陳熙遠：〈皇帝的最後一道命令——清代遺詔製作、皇權繼承與歷史書寫〉，《臺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4年6月，頁161-213。
- 陳蓮痕：《雍正奪嫡：清宮四大奇案之一》，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

1935年。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馮爾康：《雍正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

馮爾康：《雍正繼位新探》，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

黃應貴：《人類學的視野》，臺北：群學出版社，2006年。

楊天石、王學莊：《南社史長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

楊啟樵：《雍正篡位說駁難》，上海：上海書店，2012年。

劉法曾：《清史纂要》，上海：中華書局，1914年。

劉瓊云：〈帝王還魂——明代建文帝流亡敘事的衍異〉，《新史學》第23卷第4期，2012年12月，頁61-117。

蔡東藩：《清史通俗演義》，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石印本，1916年；臺北：世界書局，1980年。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燕北老人：《滿清十三朝宮闈秘史》，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8年。

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臺北：仲信出版社，1985年。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1).

Maurice Halbwach, Lewis Coser tran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Silas H. L. Wu, "History and Legend: Yung-cheng Chien-hsia Novels", In *Tradition and Metamorphosi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Professor Kwang-ching Liu's Seventy-fifth Birthday (Volume II)*, ed. by Yen-p'ing Hao and Hsiu-mei Wei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98), 1217-1259.

Silas H. L. Wu, *Passage to power: K'ang-hsi and his heir apparent, 1661-1722*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